

## 一、近代中国国货运动概论

###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国货运动的产生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革命。在造就辛亥革命爆发的社会政治斗争大环境中，不仅有全国范围内此起彼伏的人民群众反抗斗争、各地会党起事和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反帝武装斗争，还有在 1905 年反美爱国斗争中酝酿发动起来的发展近代实业、提倡土货的运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直接导致的改易服式活动触发了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以后，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实业政策的推行以及我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国货运动更如奔流一般，持久不息地向前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十分令人注目的现象。

#### 1. 国货思潮的涌动

在鸦片战争以后，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我国而来的洋货进口狂潮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先人们一般把外国进口产品统称为洋货，而把与洋货相对的我国产品都称为土货。当时土货和洋货的区别主要是：一是生产地别不同，洋货是外国生产，土货是中国生产；二是生产手段不同，洋货大多为机制工业品，土货大多为手工产品。但是随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工业企业不断开设，我国也有了机制工业品，这些机制产品仿照洋货，又与原土货有别，随着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增强，有人也把它称作国货，或把包括手工土货在内的我国产品统称为国货，以与进口的包括外资在华企业生产的洋货相区别。

20 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其标志是 1905 年爆发的反美爱国运动。为抗议美国资产阶级政府长期歧视凌辱旅美华工，为表达祖国人民对海外骨肉的同情支持，1905 年 5 月 10 日上海的《时报》刊登了“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号召人们“合群策群力以谋抵制”。同时上海商务总会也应旅美华人之请召集各邦商董集议对策。在议论中，商务总会议董、闽籍商人曾铸登台发言，“演说激昂慷慨，语语动人”，<sup>①</sup>后又提议抵制的办法，大旨为以两个月为期，如美国不允许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这一提议得到在座绅商的一致赞成，然后会议又公议电稿稟请外务部坚拒签约，同时又决议通电各埠。因通电、稟请必须有人领衔，当时各帮商董对此“逡巡却顾，重有难色”，曾铸“激于义愤，挺身捶胸而前”谓：“此公益事，并无风险，即有风险亦不过得罪美人，为美枪毙耳。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由我领衔可也”。<sup>②</sup>于是，这份由曾铸领衔的沪商“吁恳外部暂缓签约，并拟相戒不用美货”的电文迅速发往汉口、宜昌等 21 个都市。

1905 年的反美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 10 多个省的大中小城镇及乡村。先是上海有美国人开办的学校学生罢课离校，工人罢运美货，各界并成立了抵制美货的团体 20 多个，参加抵制美货的行业达 76 个。广州成立了“抵制苛约不用美货公所”，广东各地掀起了抵制美货的高潮。武汉、北京、天津及其它各地也纷纷响应，学生、工人、商界及市民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爱国义务。

由于 1905 年的反美爱国运动采用抵制美货的方式，所以对中

有些论著将此时的上海商务总会称为上海总商会，称曾铸为总商会会长，均误。上海总商会是 1912 年在取消前清商务总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在此前均称上海商务总会。1905 年 5 月开会时曾铸为商务总会议董，至同年 12 月才因其反美爱国运动中的独特贡献而选任商务总会总理。

<sup>②</sup> 苏绍栢：《山钟集》，《开会抵制》、《留别天下同胞书》。

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刺激作用。据《时报》记载：“自抵制美约之风潮起，花旗（即美国）面粉大为滞销”，汉口就有中国商人集资创办面粉公司。<sup>①</sup>这完全是各地相戒不用美货造成的国货产品市场突然扩大的结果。一些先进的人士在抵货活动中意识到“不振工艺，不精制造，而徒倡用土货以示抵制，此无价值之言也”，土货必须“改良形式，精美其物质”。<sup>②</sup>也有人认为从“暂时抵制至自兴制造”才是“真正之抵制”。<sup>③</sup>“盖不用美货也，急则治标之法，集股仿造者，探本穷源之道”。<sup>④</sup>人们还借鉴西方国家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泰西各国皆以改良土货，抵制外货为立国之本。近来吾华民族发达，……而实业未兴，空言抵制，不求诸己，奚以御人？”<sup>⑤</sup>他们还提出了一些鼓励人们从事生产制造的方法，像各埠增设美货陈列所，“劝人仿造，果有仿造精良可代美货者，商部给以专利”，<sup>⑥</sup>以示奖励等等。

群众性的抵制美货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政府实业政策的改进。后人在论及此事时曾总结道：“时美国有禁止华工之举，国人以抵制美货为抗议，故提倡国货之主张益形发展，其重要事业可得而举者，在北平有劝工陈列所，在天津有工艺总局，在各省有高等实业学堂，在南京有规模极大之南洋劝业会。其颁布之重要条例，足令吾人注意者，有商部之给商勋章程；学部之给工商科举人进士学位，光绪三十三年时，并制定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sup>⑦</sup>这些政策的实施也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

① 1905年12月2日《时报》。

《倡用国货说》，载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岭东日报》，见《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编》（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8年编印，第165页。

《山钟集·本埠及外埠来函》。

②③《山钟集·振兴实业来书》。

④《盛君治鲜致本馆函》，1905年8月12日《中外日报》。

⑦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第1—2页。

1908年山东青岛爆发过抵制德货运动，同年南方各省爆发过抵制日货运动，1909年东北人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都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程度不一的促进作用。

抵制外货的运动也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团结觉醒，有些地方的资产阶级就以这种政治运动为契机，开始组织起来。像杭州就在1905年创办了商会。据载：“自抵制美约问题起，城外拱宸桥地方通益公纱厂内高君创设商会一所，与拱宸桥湖墅一带店铺联络，为抵制美约起见，现已集议两次，俟美约废去后，该会仍不散撤，即作为整顿商务之所。”<sup>①</sup>一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制造舆论的报刊更是活跃异常。除了《时报》和《中外日报》等原有报刊外，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性的报刊，像上海的《保工报》、广东的《拒约报》、杭州的《白话报》、《女子世界》等。<sup>②</sup>不少报刊还为抵制美货等活动开辟了专栏，如《时报》的“拟制创禁例策”，《中外日报》的“论在上海之闽粤商人集议事”，福建《日日新闻》的“阅筹拒美禁华工公启系之以论”，《广东时报》的“敬告会议对付美约之诸君”，《女子世界》的“争约之警告”等。

通过斗争的实践，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已开始感觉到抵制活动的政治作用。他们指出曾铸在运动中“登高一呼”，开“我国合群团体之举”。运动起着“去压抑、保自由、吾国文明起点”的作用，“有此一举可以规国民进步；有些一举可以杜外人轻视”，“成则中国民族为世界上可贵之民族，不成则中国民族将愈奴隶牛马不若而听人宰割”。<sup>③</sup>苏州的一个抵制团体公开提出：政府签订新约“必先布告中国，使国民全体公认，方可签字。否则续约虽订，吾国民决不承认”。<sup>④</sup>曾铸也稟文外务部，要求“此次约本必须寄与

《杭州创办商会》，1905年8月11日《中外日报》。

② 阿英：《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序第23—24页。

《山钟集·本埠及外埠来函》。

④ 1905年10月5日《时报》。

沪商公阅方能由部画押”。<sup>①</sup>有的报刊文章甚至开始将矛头直指卖国政府，认为“我政府之不足为吾民可恃也久矣，衮衮诸公类具奴隶性质，而无爱国思想，拥虚位食厚禄，日以苟且图存为事”。<sup>②</sup>这种剖析清政府卖国性质的檄文，自然对动员群众进一步认清清王朝的统治本质有帮助。

20世纪初期频繁发生的抵货运动，当时就被一些西方国家看成是中国民众的排外运动，其实这完全是一种站在西方列强立场上的政治偏见。对于这种论调，当时的一些革命者就给予驳斥。他们指出：“晚近我国民排外之观念与前兹之排外观念有绝异者。前兹之排外锁国之主义也，内中国而外夷狄思想也。今兹之排外则浸进为权利之主张”即“主张自国之权利而于其必需者排除外国人为使共有之谓”。<sup>③</sup>

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能，已开始注意到国货的制造和销售关系到中国的命运，更联系着自己的切身利益。于是，这种国货思想开始在一部分先进人士的头脑里涌动，特别是在抵制外货的活动中，国货思想就像江底的潜流不时地涌向江面一样，启发人们的新知，冲击陈腐的旧制度。

由此可见，从1905年抵制美货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国货思潮，从思想观念的更新、资产阶级的成长及对晚清政府的批判等方面为辛亥革命的社会政治变革准备了条件。

## 2. 国货团体的产生和活跃

从抵制洋货运动中引发出来的国货思潮为国货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但国货运动以比较完整的形态正式产生，还需要

<sup>①</sup> 外务部档案，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曾铸稟，又见《山钟集·上外务部书》。

<sup>②</sup> 1905年6月6日《时报》。

<sup>③</sup> 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4号。

经济上发展实业的思想和政策的进一步推动、民主思想的进一步激励及社会运动产生的相应触媒的生成。这些条件正是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形成和给予满足的。

国货运动产生的最早触媒是民国建立前后改易服式的浪潮冲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顺时代潮流，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如建元改历、限期剪辮、保障人权、劝禁缠足、改变称呼等，有力地冲击着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弊政和陋习，起着解放人们思想的作用。在辞旧迎新的社会改革中，人们“首议变更冠服章制”借以冲击清朝的旧制度旧习俗。出于对晚清陋习的憎恨批判，人们改易服式的要求更加迫切。这股随政治革命而来的改易服式浪潮对衣帽业有关的工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1年12月，上海绪纶公所、衣业公所等10个团体为维持国产衣帽的销售和生产，成立中华国货维持会，以“提倡国货，发展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为宗旨<sup>①</sup>。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早期活动大多为提倡国货销售一项，而且主要还限于服装衣帽等行业的国货销售。他们的这些活动当时就得到沪军都督府商务总长王一亭的支持，他在通告中称：“发辮固宜割截，礼服尚待磋商。……曾见维新之辈，纷纷改效西装。国货销场日滞，银钱输入外洋。……凡我同胞注意，其各猛省毋忘。”<sup>②</sup>鉴于临时政府提交参议院讨论的《服制案》中有“主张绸呢并用”的提法，中华国货维持会认为“吾国织呢，均在幼稚，物品之美、物质之坚远不逮东西各国。此制一行，势必舍绸而呢绒。虽爱国之心人所同有，未必尽人皆用呢绒，然而多用一份呢绒，即少用一份国货，少用一份国货即损我国家一份利源”。<sup>③</sup>于是他们一面推派代表吕葆元晋京请愿，要求政府颁

《会史》，见《中华国货维持会廿周年纪念刊》（以下简称《廿周年纪念刊》）。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4页。

《国货维持会代表吕立基呈参议院文》，1912年7月19日《申报》。

布明令，采用国产衣料，以维持国货；一面致电参议院法制局，请求将“绸呢并用”改为用中国自制呢”。经过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力争，1912年10月参议院正式通过的《服制法》明确规定各种大礼服、常礼服、大礼帽等“料用本国纺织品”。这一决定实际上是政府对倡用国货的民族资产阶级作出的积极反应。中华国货维持会在成立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为倡用国货，开展了大量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是：（一）倡导国人使用国货丝缎，推定代表赴京请愿用国产衣料；（二）编印散发各种宣传物品，例如代云锦公所散发传单5000份，转发绣业、帽业提倡国货意见书12000份，制定丝棉标本函送海外华侨等；（三）通函上海各大商店，请销各类国货产品；（四）调查各类国货新产品，提倡宣传；（五）调查缎业、帽业等国货行业，并加以劝导改良；（六）联络福州、天津、长沙、安庆等外埠国货团体和国货销售机构；（七）召开国货宣传大会，并定期举行国货宣讲会；（八）向华侨宣传国货思想等。<sup>①</sup>由于中华国货维持会在上海全力推动各项国货宣传，并对各地的国货活动有巨大的影响，从而也树立了其在全国国货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不少外地成立的国货团体也纷纷自称某地中华国货维持会，有的还直称中华国货维持会某地分会，以上海作为总会。

除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外，上海和各地还成立了不少提倡销售和生爱国货的团体，1912年2月上海由诸宛明、陆连魁、江确生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生国计会，其宗旨为提倡实业，顾全同胞生计，积极从事提倡国货的活动。同年3月俞赞臣、金容仲等在杭州发起成立全浙国货维持会，宗旨为提倡国货，发展实业。5月安庆成立了安徽商务研究会，其宗旨为维持国货。同年，安庆维持国货会也诞生了，福州南台去毒总社发起成立保存国货公会，长沙商界也组织国货会。同年6月姚明德、陈谟、金纯德等在哈尔滨发起成

<sup>①</sup>《廿周年纪念刊·会务记录》。

立黑龙江实业总会，并参与创办国货冠服公司等，以推进全国的实业活动。上海的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它“以群策群力建设工业社会，企图发达工业为宗旨”在团体的工作计划中就列入了“规画国货维持法，以保护工业于不败”的内容。<sup>①</sup>

1913年4月，邹静斋、马乙棠、定与九等在上海创办旅沪客帮商务联合会，以维护客帮利益，同时也积极从事提倡国货的活动。1913年，川沙王青一发起成立国货进行会，其宗旨为会员实行国货，介绍推广各处新产品，提倡实业，改良国货。同年成立的各地中华国货维持会或分会还有通海、南京、苏州、嘉兴、镇江、桐乡、直隶、硖石等。

1914年又有中华国货买卖介绍所成立。

1915年，上海又成立劝用国货会，提倡国货销售。其它的国货销售机构也纷纷成立，就是由妇女组织起来的实业团体中，也不乏提倡国货的机构。像女子兴业公司就是以“提倡女界专用国货”为宗旨的企业。<sup>②</sup>植权女子物产公司“以发挥民生，提倡国货为宗旨”，女子振兴国货公司也是倡用国货的商业组织。<sup>③</sup>

中华国货维持会及一批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社会实业团体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国货运动已从思想酝酿阶段发展到实际提倡阶段。所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国货运动的开端。

这一时期纷纷成立的倡导国货产销的团体，除了民初改易服式浪潮的催化引发外，还同民国初期政府发展实业的思想和政策的直接推动有关。

孙中山在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以前，就认定在共和国建

① 《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7页。

② 1912年11月14日《时报》。

③ 1913年2月20日、1月14日《申报》。

立以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重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sup>①</sup> 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不久他又指出：“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sup>②</sup> 《临时约法》又明文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赋予民族资产阶级经营实业的自由。南京临时政府出于“国家富源，在于实业”的指导思想，不仅在中央设实业部，还饬令各省都成立实业公司，司理国家和地方的农工、商矿、山林、渔猎及度量衡。<sup>③</sup> 临时政府的内务部还颁发了“劝导冠服须用国货”的布告。<sup>④</sup> 在1912—1915年间，政府还制定了大量有关实业的法令，取消了对开采矿产的若干限制，取缔了一些封建性的专制垄断权，奖励商办企业，给予部分捐税优惠等。上海地方政权对国货厂商也予以保护支持。如上海冠华制帽公司生产的“雄鸡”商标各种西式凉帽，为防止伪劣商品假冒，请求立案保护，就得到沪军都督的支持。商务总长不仅发布了劝用国货的通告，<sup>⑤</sup> 还以“土货不能畅销，推源其故，实因缺乏研究商业之场”建议特设商品陈列所，“以资讲求”提倡国货。<sup>⑥</sup>

1912年9月，北京政府工商部发出了召开全国临时工商会议的通知，上海总商会总理周晋镛提出了工商界向政府请愿的要点，其中之一就是“维持国货”。1912年11月1日至15日，中华民国工商部在总长刘揆一主持下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到会的实业界人士达一百多人，为“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sup>⑦</sup> 会议

《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7页。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④ 《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2月5日令示。见《辛亥革命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9、202页。

⑤ 1912年7月12日、12月24日《民立报》转引自《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49、534页。

⑥ 1912年7月25日、8月30日《中华民国报》。

⑦ 《全国工商会议开幕记事》，1912年11月20日《神州日报》。

的宗旨是“谋工商矿业改良发达，函欲集全国实业家及专门学者之意见，讨论方法以备采择”。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国内的 136 人，来自海外东南亚、日本等地的华侨 12 人。这次工商会议议决的案件共 31 件，其中就有维持国货案。

农商部成立以后，为在欧战爆发后进一步推销土布（“爱国布”），张謇在 1914 年 10 月呈文请免土布税厘，主张对“专持人工之棉织土布，无论是何种花色种类，所有常关、海关、厘金、落地捐、崇文门等项税厘，一律免除”。<sup>①</sup> 1915 年 2 月，又呈文请免七种自制工业品关税，以利国货产品出口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sup>②</sup> 1915 年 3 月，张謇还就关于整饬国货办法再次呈文，“对于外货之竞争，国货之维持”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其中包括“有早已筹办而仍俟扩充者，有正在商办而力图进行者，有久拟创办亟欲观成者，有虽经举办而未臻完备者，有决定试办而尚待筹商者”等几类。呈文提出“凡日用品向由外国供给，而为本国所能仿制者，此类工厂，尤应特别保护”。鉴于民国财政困难，政府“此时实际上之补助，未易实行，名誉上之奖借；诚不容缓”，一俟“将来国家财力稍为充裕，尚拟指定有望之商品、得力之工厂，酌给补助金，以收实效”。呈文还提出了一些扩充国货销路的具体办法，对“教育用品、军用品、交通用品等，分别指定已成各厂，商明关系各部”，劝令各部“所辖局、署、厂、校等以公家力量，限定购用，以重国货”。<sup>③</sup> 这样，不仅国货市场可得到相应保证，而且还可以使“办理工厂者，资本上既无停滞之虞，则制造上自有改良之望”。呈文并对政府以国家资本开设公司，倡导模范企业，设立化学工艺

<sup>③</sup> 《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4、274、276 页。

其中外销之草帽辫、地席减半征收税银，通花边抽、通花绸中抽、通花夏布、发织鬻网免征出口及复进口税。

研究局，从事工艺改良研究，以与外货竞争抗衡，发展国货运输，设法减免厘税等项逐一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915年，农商部鉴于“近来本国人民，对于国货制造，颇能刻意讲求”，又在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国货展览会，以资策励”。<sup>①</sup>总之，在张謇任农商总长期间政府所制定、实施的这些条例、办法和措施，都对国货运动的发生发展有程度不同的促进作用。

另外，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政府，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还促进了中国民主思想的高涨，国民公民意识大大增强，这也对国货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思想条件。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符合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根据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天赋自由”的原则规定了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公权”与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等“私权”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政令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革命，促进了民主思想的高涨。民国政府的各级政府机构比清政权任何时候都重视发自民间的国货思潮，这就促成了当时各种提倡国货社会团体的成立，国货运动也更加活跃。

中华国货维持会在筹备成立时就受到民国上海地方政府的支持。1911年12月20日，沪军都督陈英士就批示中华国货维持会，对其改易服式的要求表示：“个人常服自以多用国货为宜。惟我国丝绸不合于制造西服，因之呢绒畅销，利权外溢，本都督亦心焉忧之。尚望绸业各商力谋改良，务求适合于制造新式衣装之用，则不但流行于国内，即外人见之亦当乐于购买。”<sup>②</sup>为扩大宣传，中华国货维持会特假南市新舞台召开国货宣传大会，沪军都督陈英士、民政总长李平书和省县各机关代表都出席大会，列席者达3800多

<sup>①</sup>《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第274、276页。

<sup>②</sup>1911年12月20日《申报》。

人“；车水马龙 极一时之盛。军政商学各领袖 对于提倡国货的意义 阐发无遗。”<sup>①</sup>上海商界举行的会议，孙中山也以普通国民一员的身份参加讲演 倡导“民国成立 国民须人人有爱国心”，各就其业 改良提倡 尽应尽之义务”。<sup>②</sup>在临时大总统任期内，孙中山对于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来函十分重视，及时给予详细答复，他对国货维持会在改易服式浪潮的冲击下，倡导使用国货产品的爱国热情予以充分肯定 认为国货维持会“对于易服问题 极力研求 思深虑远 具见关怀国计与廛念民艰热忱”。<sup>③</sup>孙中山在复函中还具体地分析了在辛亥革命浪潮鼓舞下人们改易服式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产生的一些问题 他说 在前清“人民屈服于淫威之下 疾首痛心 故乘此时机 欲尽去其旧染之污习。去辫之后 亟于易服 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命外货畅销 内货阻滞。”<sup>④</sup>在改易服式的具体办法上 孙中山认为：“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此为一定办法，可无疑虑。”<sup>⑤</sup>他并对时尚的西式服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选定服式的标准应该是“适于卫生 便于动作 宜于经济 壮于观瞻”并鼓励中华国货维持会对服式“切实推求 拟定图式 详加说明 以备采择”。<sup>⑥</sup>他还热心地把“平日究心服制”于“西式服装制作甚精”的陈少白 黄龙生推荐给中华国货维持会当顾问。<sup>⑦</sup>孙中山当时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还以国民一员的平等地位详细函复中华国货维持会，这自然对国货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国货维持会接孙中山来函后，即将“原函印送各会员”，<sup>⑧</sup>以鼓舞斗志，推动国货运动的深入开展。

在以后的倡导实业活动中，孙中山也多次关心地论及国货与

① 《廿周年纪念刊·会史》。

② 1912年4月17日《民立报》。

③④⑤⑥⑦ 《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1912年2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2年版 第61—62页。

⑧ 《廿周年纪念刊·会务记录》，

洋货的销售竞争，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提倡国货的根本途径。他说：“洋布便宜过土布，无论是国民怎么样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如果一定要国民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那便是和个人的经济原则相反，那便行不通。”<sup>①</sup>这里，孙中山实际上是向人们指出了国货与洋货竞争的根本出路，即在同样的情况下，国货产品只有在生产中不断改进，做到价廉物美，才能真正在市场上站住脚跟。

由于受到国民政府及其领袖们的关注，加上辛亥革命造就的空前的社会民主气氛，使国货运动进一步活跃起来。中华国货维持会充分利用革命政权赋予民众的民主权利，开展自己的活动。国货维持会成立以后就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呈请沪军都督陈英士和民政总长李平书立案保护”。在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以后，又直接“电呈大总统，请求通令全国一致提倡国货。”在袁世凯任大总统以后，又“电呈大总统，请求通令剪发不易服。”为推动国货活动的全面展开，国货维持会还“公推代表，分赴党政各机关，请求提倡国货，一致进行”并多次“通函各省区、县区商会，请一致组织国货团体”。特别是在制定《服制案》的过程中，国货维持会更是多次电呈大总统、参议院：“请求规定服制条例，从速公布。并函请总商会，协助电请”，以造成更大声势。<sup>②</sup>此外，中华国货维持会还分别电请内务部等，积极提倡国产丝、棉织品。

国货维持会的活动也对辛亥革命的深入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中华国货维持会立即致电表示祝贺，在北伐中，维持会又代销北伐助饷戏券，在倡导国货活动中，它召集全体国货维持会成员欢迎工商总长。它还派员参加宋教仁的追悼大会，并致送挽联。这些都表明了中华国货维持会坚决

<sup>①</sup>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77 页。

<sup>②</sup> 以上均见《廿周年纪念刊·会务记录》。

地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边，全力支持社会政治变革的立场。

### 3. 一泻千里的国货热潮

由于有民国政府提倡实业思想和政策的推动，又受到民主思想的激励，加上以中华国货维持会为中心的倡导国货活动积极分子的大力推进，国货运动从产生以后便以一泻千里的态势奔流不息。

仅以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来说，在 1913—1915 年期间，它开展的倡导国货、振兴实业的活动就有：提倡各民族资本企业所生产的各种国货产品的销售；征集各处样品送赴各地展览陈列；倡导发展实业，研究国货产品的改良；提倡各种替代进口产品的制造；调查国货产品的海外销路；了解海外各地的华侨经济；并以欧战为契机宣传扩大出口；调查商品税则；呈请政府裁厘加税；参与组织中华国货展览会，并代为征集国货展品；进一步开展国货宣传；提倡国货教育等。这些倡导国货的活动不少都是搞得有声有色的。在宣传方面，它定期举行宣讲会，并适时组织大规模的宣传大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除会员们轮流参加宣讲外，还特邀社会各界名流参加演讲。宣讲的主要内容为宜用国货、发展商业、提倡国货外销、宣传办厂仿造洋货、要求改良国货产品、进行国货教育、要求关税自主、改革币制、统一度量衡、研究企业管理、宣传爱国思想等。在开始宣讲时，人们一时不十分了解，前来听讲的人数不多，但经宣讲者的不懈努力，听众数量大增。后来，国货维持会还每年举办救亡大会，更大规模地宣传国货运动，使国货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编印定期刊物，散发宣传物品也是中华国货维持扩大国货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方便各界购用国货而编印的《国货调查录》始于 1915 年第一期即印发 10 万份 颇受欢迎。同年创办的《国货月报》，内容为宣传劝用国货、改进国货生产、介绍国货运动动态，第一期始印 2000 册，后增加至 5000 册还“无告积存”。中华国货维持会 1912 年散发的各项劝用国货、调查国货的宣传品份数为

189500 份,1913 年为 220000 份,1914 年为 157500 份,1915 年为 318000 份,即四年中印发的传单印刷品达 885000 份。

为推动国货生产和销售,积极倡导国货产品的陈列和展览,也是国货维持会的重要工作。1915 年,农商部决定在首都北京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专门委托中华国货维持会代为征集展品。由于展览会从发起筹备至陈列展出,总共只有半年时间,加上当时我国各地多风气未开,而交通又极不便,所以困难相当大。<sup>①</sup>但经过国货团体的共同努力,全国 28 个省都选送了展品到会陈列展出,其中中华国货维持会出力尤多。国货维持会受托以后,立即组织了专门的征集机构。<sup>②</sup>并采取了预先登记挂号,一周以后即办理收货的办法,及时完成了国货品和征集工作。正如当时工商司在致开幕词时所说“中华国货维持会”此次以本会征集商品“特组织机关联络商人,广为劝募,号召所及,出品独多”。<sup>③</sup>在展览期间,为对国货的生产和销售作一较全面的考察,国货维持会还由王介安,庞藻等组成了共 42 人的参观团前往北京参观考察。

为加强国货的销售,一批由中华国货维持会会员主持组织或由维持会协助支持的国货店号先后开张,其主要有 1912 年王汉强开办的上海华粹国货公司,天津宋则久开办的天津工业售品所。1913 年俞植权创设的上海女子植权公司。1915 年王文典等创设的隆泉公记号等。除上述外,至 1917 年时仅在《国货调查录》(第四册)上刊出的国货商店还有同昌丝绸公司、中华国货公司、爱国来国货公司等 26 家,遍及上海、苏州、遵义、蜜县、嘉兴、宁波、芜湖、温州、福州、北京、天津、汉口以及南洋的新加坡、三巴瓏等地,形成了一批专销国货的店号。

① “记国货展览会”,《国货月报》第 2 期。

② “中华国货维持会筹备国货展览会出口办事规则”,《国货月报》第 2 期。

③ “国货展览会报告书”,《农商公报》第五卷,第 10 期。

经销国货产品最活跃的要数天津的宋则久主办的工业售品所了。在天津，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有了工业售品所，那是清末周学熙在经办直隶工艺局时，为展出天津工艺学堂及实习工场产品而设立的商品陈列和销售点。1913年因兵变被焚，重建以后改称天津工业售品总所，除展销实业工场的产品外，还经营其他民营工厂的产品。但终因经销产品质量差和价格高，售品所的资本小而利润极微，不得不于1913年招商承办。

接办天津工业售品所的就是著名的国货运动倡导者之一的宋则久。宋则久出身于一个钱庄小商人家庭，15岁时即进入义德泰绸缎庄当学徒，后先后进入庆祥、隆生锦等商店从商，并在敦庆隆绸缎庄任经理。在1905年，宋则久即与人合资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北京火柴公司、报国公司，生产牙粉，从事国货制造。1912年，他又创办了直隶国货维持会，并与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取得了经常的联系。直隶国货维持会在宋则久的倡导下编辑出版《白话报》。宣传振兴实业，强国富民，还以顺口溜的形式编写了不少维持国货的歌词和口诀。

宋则久接办工业售品总所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其资本除宋则久出资的两万元外，再也无人参与合伙，全部股资风险都由他承担。其次，售品所的货源十分困难，原来实习工场和其他天津企业的产品不过300余种，很难维持30余人的商业企业。敦庆隆的财东了解宋则久经营的艰难，劝他仍旧回去主持敦庆隆的业务。但宋则久为全身心地投入国货活动，宁肯放弃原有优厚的待遇，婉言谢绝他们的挽留。他说：“我作绸布洋货，于己有益而于国家有损。我干国货，干得好国家受益多，干得不好国家受益少，但总是于国于民有益的。我宁愿牺牲小我，舍私而从公，绝不半途而废”。<sup>①</sup> 经过

全国政协文史办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225页。

宋则久的积极宣传，并指导供货企业积极改良产品，提供新货源，工业售品所 1913 年的售货品种就从 300 种增加至 500 种，到 1914 年又增加到 750 种，在 1914 年至 1918 年的欧战期间，国货产品的市场进一步发展，国货产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大为增加。1915 年售品所的货品种数增加到 1250 种，1916 年为 1900 种，1917 年为 2500 种，1918 年达到 3100 种。国货产品经销业务的不断扩大也导致售品所在 1919 年正式改名为国货售品所。

由于各项活动的开展，不少国货团体自身的会务活动也日益增多。据统计，中华国货维持会的个人会员 1912 年为 113 人，1913 年为 458 人，1914 年为 537 人，1915 年为 629 人，1915 年已有 49 家国货厂商直接参加国货维持会。国货调查工作 1912 年为 11 次，1913 年为 22 次，1914 年为 22 次，1915 年为 83 次。中华国货维持会议决的案件 1912 年为 71 件，1914 年为 70 件，1915 年为 147 件。

由于国货宣传的普及深入，人们对于国货生产改良的认识也更加一致，中华国货维持会成立不久，戈云朋就在演讲会上宣传“改良国货即是实在维持国货”，实在维持之道无他，即改良耳。货而改良，见者生爱，远胜于赖提倡之言维持其货也”。<sup>①</sup> 他还在会上疾呼：“国货销于国内者当然，销于国外者亦然，若已改良制法而尚不良，必再改良。若再改良制法而仍欠良，必再再改良，不可无恒心”。<sup>②</sup> 通过反复的宣传，在人们心目中就逐渐确立了提倡国货就必须改良国货的认识。

通过宣传活动，国货界也在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增强了阶级意识。王介安、王文典等认为：“研究改良制造新品，固全为工商之责任。若徒恃政府之援助，而不自谋振作，仍难操优胜之权。故

《廿周年纪念刊·会史》。

《论说》，《国货月报》第 2 期。